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〇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七五期 ——
(二〇〇六年一月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1c)

【往事回首】“四人帮”倒台前的姚文元	霞 飞
【人物春秋】“将军大使”耿飆的“文革岁月”	何立波
【历史一页】东湖风云录（之四）	徐海亮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回首】

“四人帮”倒台前的姚文元

• 霞 飞 •

1976年，姚文元收到了两封奇怪的信，既不交给华国锋，也不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流的“四五”运动。

4月1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的下面写着：“《人民日报》总编辑收”；信封的背面写着：“请戈培尔编辑收”。《人民日报》的一位负责人拆开一看，信封里面装着的是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份报纸上登着《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寄信人在这份报纸的刊头“人民”二字上打了一个大黑叉，然后加上两个字：“造谣”。接着，寄报人在这份报纸的空白处写下了如下批注：“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了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江家小朝廷？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江、姚!!!”

拆信的这位负责人见此，连忙把信送给当时《人民日报》的总负责人，随后，此信又被送到姚文元手中。姚文元读着这些文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但他还是装作从容的样子，把这份《人民日报》装入信封之中，然后问：这件事还有谁知道？《人民日报》总负责人答道：除了我和那个拆信的负责人之外，再没有人知道。姚文元又问：这么说，只有你、我和那位同志知道？那位负责人回答：是的。听到这话，姚文元长出了一口气。他交代：这件事，只限于我们三个人知道，谁也不准说出去。此后，姚文元把这封信锁在自己家的抽屉里。他没有把这封信交给已经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也没有把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看。

7月，毛泽东的病情加重，“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正在这时，姚文元又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是7月下旬新华社负责人转给姚文元的。信是由新华社某省分社的一名记者写的，信封上写着：“姚文元同志亲启”。姚文元拆开信一看，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这封信反映的主要内容是：某省省委的一位同志对新华社分社记者讲述他在1976年初在北京养病期间，某某的儿子去医院看望他时，说了一番别有意味的话。这番话的主要意思是说，毛主席现在病得很重，活不了几天了。现在华国锋虽然当上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但是没有能力，在工作上一边向李先念问问，一边向张春桥问问，这样把两方面的意见凑起来做工作。华国锋在外事工作上也没有经验，而某某则能力强，现在不高兴多管事，不高兴出主意了。现在政治局是新派和老派之争，老派现在不开口，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来就是血雨腥风。老派、新派无论谁上台，都要流血。上海是新派的地方，死了多少人呀！老派上台也要流血，但比较起来还是老派上台好一些。某某的儿子还对这位负责人说：回去给省委打个招呼，对将来的事情要做好准备。写信的新华社记者还要求姚文元看过这封信后，把信转给毛主席。

姚文元把这封信看了三遍。看过之后，他思忖再三，还是把信压下来。

姚文元扣信，到底是出于怎样的想法？犹豫再三，姚文元决定“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姚文元把这两封信扣下，他到底是怎样想的？

从后来姚文元的交代看，他是想：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指“四人帮”）有垮台的可能性，如果把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就是把自己完全捆在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的战车上；如果不交给他们看这封信，静观事态变化，一旦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垮台了，他就把这封信，连同4月12日的信，一并交给华国锋。这是表示拥护华国锋领导的一种形式，华国锋就会认为姚文元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不是一回事，会感激他。说不定他还会当政治局委员，至少不会跌得太重。

中央专案组在1980年7月17日审讯姚文元时，姚文元曾交代说：我感到毛主席逝世后，我自己会被批判的。“过去毛主席一直是保护我的。毛主席逝世后，我就联想到毛主席说过的‘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我就担心解决到自己头上了。”姚文元还交代，毛泽东病危时，他和纪登奎负责准备文件，以姚文元为主。姚文元找来朱穆之、鲁瑛、莫艾、许健生、邓岗，一起布置毛泽东逝世后的宣传工作。他们商量完工作后，姚文元把鲁瑛留下来单独谈话。他对鲁瑛说：这几天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了，你要继续做好报纸出版工作，现在阶级斗争形势还是很复杂的，要提高警惕。到底怎样，还要看一看。姚文元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他自己感到“四人帮”在中央内部已经十分孤立。1980年姚文元在接受审讯时说：我想，如果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他

们，他们就会马上追究，而这两封信不是一般的信，必定与中央内部高层人物有关，追来追去，不一定追查清楚，反而会在中央内部树敌过多，使我在中央内部处境不利。

从姚文元的上述交代来看，他是预感到“四人帮”要垮台，他自己也要出事。他不把这两封信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就是预备一旦出事，他好有一个向华国锋、叶剑英请功的东西，也好把自己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区别开来。

姚文元是否考虑过在毛泽东逝世后，他要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断绝帮派联系呢？显然是考虑过的。姚文元在1976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了他的矛盾心情。他是想与江青等人从此保持一定距离的。那时，人们已经开始“疏远”和“不满”江青了。姚文元还记得：“不知为什么”，13日上午，华国锋、王洪文、他本人一同会见前来吊唁毛泽东的外宾时，江青却没有参加会见，后来江青“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国锋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

但是，姚文元经过反复权衡，最后还是下决心要与江青等人一起搞，这固然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主要还是因为姚文元认为华国锋软弱，成不了大气候，老干部们都老了，早晚要下台，只有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搞在一起，自己今后才能够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他还认为，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没有人能把她怎么样，今后她还会在中央占有很大势力；还有一点，姚文元是由张春桥一手提拔上来的，在过去的日子里，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这也保证了他的飞黄腾达。他对张春桥佩服得五体投地。姚文元相信，继续听张春桥的，没有错。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不能疏远江青，我不能这样做，要努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正是出于这一想法，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还写道：“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喜欢的的生活是战斗！’”

为了反对乃至搞掉华国锋，姚文元篡改了毛泽东临终嘱咐，大力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不久，姚文元就布置人写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并且亲自写好了社论的提纲，口授了大体内容。9月15日，社论稿起草好之后，送给姚文元修改时，他决定把自己篡改的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加进社论稿中，并且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

姚文元在社论稿中加写道：“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为题，发表了这篇社论。

姚文元加写的这些文字，成为两报一刊社论的主旨。“按既定方针办”实际上是说，按照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党和国家要按照“四人帮”坚持搞的那一套来办，就是按搞“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办。

1980年底，中央专案组在审讯姚文元时曾经问他，为什么要捏造毛泽东临终嘱咐？姚文元在回答中说了这样的话：“毛主席逝世前后的一些情况，使我感到用了这句话可以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保持稳定，就是说解决‘四人帮’问题可以不会马上发生。”“我认为它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具体包括哪些，我也没有想过。”

姚文元“积极”发挥他舆论总管的作用，专在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上下工夫。他认为，这样最保险，可进可退，如果“四人帮”成功了，他姚文元可以算是立了大功的人；如果“四人帮”失败了，他姚文元只是抓一抓中央定的宣传方针，算是跟人跟错了。

姚文元为什么会这样想？事出有因。

“按既定方针办”，是张春桥最早捏造的。张春桥曾经对王洪文、姚文元说过，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时，主席拉着我的手低声说：“按既定方针办。”一旦“四人帮”失败，姚文元可以把这一切往张春桥身上推，推掉自己的干系。

“四人帮”坚持宣传“按既定方针办”，华国锋针锋相对“照过去方针办”

小算盘打定之后，姚文元便放开胆子，督促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9月17日，姚文元安排《解放日报》发表几个大标题，一个是通栏标题：《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一个标题是：《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个标题是：《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还有两个并列标题是：《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9月19日，姚文元打电话指示新华社：国庆报道，要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当天，姚文元又一次打电话指示新华社：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

9月20日，姚文元打电话指示新华社：反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要有“按既定方针办”这方面的内容。

9月23日夜，姚文元打电话给新华社：你们要铭记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鼓舞，坚决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9月30日凌晨3时，姚文元打电话给新华社说：30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工农兵学商代表参加的庆祝国庆座谈会上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姚文元的这一系列举措，先是引起了叶剑英的警觉。当两报一刊的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发表后，叶剑英在“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下面用红铅笔画了一条杠，在旁边打了一个大问号，交给华国锋，目的是提醒华国锋注意。但华国锋却没有注意到叶剑英的提醒。9月17日，上海的《解放日报》以大标题的形式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时，叶剑英拿着这张报纸找到华国锋，当面对华国锋讲：“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与你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的“照过去方针办”不一样，他们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临终嘱咐，是别有用心。

叶剑英的一席话，引起了华国锋的警觉。原来他只是认为“按既定方针办”与“照过去方针办”这两句话的意思差不多，现在他认识到了“四人帮”捏造“按既定方针办”是别有用心。

的。华国锋首先把这个疑问同汪东兴说了。汪东兴决定找机会由他出面澄清问题。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华国锋将于第二天在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的发言稿时，汪东兴指着“按既定方针办”一句话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讲‘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宣传中央的两个文件。”汪东兴说这句话时，表情十分严肃，口气强硬。

出乎姚文元意料的是，一向老实厚道的华国锋，在这个问题上毫不退让。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座谈会上，华国锋发表讲话时，根本不提“按既定方针办”。10月2日，华国锋在乔冠华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中，把“按既定方针办”的字样统统删掉了，并且专门写了一段批语：“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

华国锋的这一批示传下来后，叶剑英立即在自己的名下画圈，批示“同意”。王洪文也在自己名下画圈，跟着叶剑英批示“同意”。

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张春桥在写了“同意”二字后，又写了一个批注：“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传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张春桥的这一手确实厉害，华国锋的批示不下达，就等于被封杀了。

姚文元在被抓前的最后几小时，才把两封奇怪的信告诉张春桥，然而，却没有引起张春桥的注意。

姚文元看到华国锋的批示后，心中明白，华国锋这个批示是针对“四人帮”的，特别是对他的。他感到，华国锋已经站到了老干部一边。他接到的两封信中，对此也有预言。他由此想到了自己将面临的政治抉择：是就此罢手，听华国锋的，还是继续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搞“四人帮”？他选择了后者。于是，他根本不理睬华国锋的批示，照样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不仅如此，姚文元还与华国锋较上了劲，对华国锋搞反调查。10月3日，姚文元把《人民日报》总负责人找到他家里密谈。姚文元说华国锋对“按既定方针办”有批示，在这上面出了问题。还说，有人借社论引用毛主席这句话大做文章，攻击《人民日报》。“你不要小看这件事，从最近情况来看，表面上还是比较平静，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要宣传，只是稍微减少一些，以应付上边。同时，要抽几个《人民日报》的人，组织一个调查组，调查一下这个“按既定方针办”是不是华国锋最先提的（因为有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是华国锋说的）。如果查实是华国锋说的，那说明是他的问题，完全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攻击他，至少可以说他头脑不清醒。《人民日报》总负责人得到姚文元的指示后，亲自打电话给刘湘屏（当时任卫生部部长）核对，同时派人专门调查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是怎么讲的。对此，《人民日报》总负责人在他写的交代材料中说得很清楚：我们调查华国锋同志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的原话，是“阴谋嫁祸于华国锋同志”。

但是，姚文元没有想到，正是在“按既定方针办”问题上，华国锋更加认清了“四人帮”的本质和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他于10月4日已经下定了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决心，并且确定了抓捕“四人帮”的方案，指定汪东兴具体落实。

10月6日，姚文元一整天都心神不宁。他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但却又说不出。于是，他去找张春桥谈心。这是他与张春桥最后一次秘密谈话。谈话中，张春桥攻击华国锋对批邓不积极，攻击叶剑英打算与美国人合作发展海军。张春桥谈话时，姚文元一直在静静地听着，他

以往也是如此。等张春桥说得差不多了，姚文元犹豫再三后，还是决定把他收到的两封奇怪的信告诉张春桥。姚文元说：“我接到了两封信，里边说毛主席逝世后，可能立即宣布某某是叛徒。这种问题并不一定是真的，但应提高警惕。”姚文元向张春桥说这两封信时，并没有明确告诉张春桥信中写的就是张春桥的名字，而是用“某某”来代替。姚文元这样欲言又止的态度，如果是在过去，早就会引起张春桥的警觉，他就会追问事情的原委。但这一次却是一个例外，张春桥居然没有什么反应。

得不到要领的姚文元从张春桥那里回来，总觉得心惊肉跳。他自己后来交代说，回到家里，“心情很不好，总有一种恍惚不安的感觉。吃晚饭时，我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们不要难过。’当时孩子吓坏了，不懂我这话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说：‘你思想反动了。’我当时也没有多做解释。今天回忆起来，我的这些话，我的这种不安的想法，虽然是受了那封信的影响，但如果我自己思想上坚决相信党，相信人民，同‘四人帮’彻底决裂，就不会说这种话的。由于我没有彻底决裂，所以我觉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险，生命也不行了”。

10月6日下午，姚文元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怀仁堂一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当姚文元来到怀仁堂时，被工作人员引到东廊大休息室。姚文元一进大休息室，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团长就迎上前来，站在姚文元面前，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向他宣读了中央关于对他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姚文元目瞪口呆地听着。听后，他没有做任何反抗，也没有争辩，只说了两个字：“走吧。”

姚文元的政治生命到此结束。

□ 《党史博览》2005. 12

~~~~~

## 【人物春秋】

### “将军大使”耿飚的“文革岁月”

• 何立波 •

耿飚是我军一员著名战将，长征途中曾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团长，和团政委杨成武一道，强渡乌江，夺取天险娄山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作为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耿飚率部参加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南渡乌江，从云南境内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战役战斗。1950年初，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先后担任中国驻瑞典王国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大使等职，成为著名的“将军大使”。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耿飚也经历了一场非同寻常的考验。

◇ 耿飚与所谓的“耿、黄反党集团”。

1967年初，我国各驻外使领馆人员都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时任驻缅甸大使的

耿飚，也面临着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造反派为了让耿飚妻子赵兰香背靠背揭发耿飚，让她先回国。

耿飚回到北京后，尚未回家，就被造反派“接”到了外交部，勒令他交代在驻缅使馆工作中所犯的“罪行”，以及在任副部长时如何执行“三和一少”的“资产阶级外交路线。”造反派暗示他揭发外交部长陈毅，遭到耿飚的严词拒绝。此后，耿飚和妻子赵兰香便开始了被审查、被批斗的苦难历程。

有一次，造反派逼耿飚交代他和刘少奇的“黑关系”，结果一无所获。造反派又把诱供的对象放到还在领导岗位的陈毅身上。但是耿飚就是不就范，他们无可奈何，气急败坏之下，又追问耿飚为何要在“文化大革命”前挖空心思图谋钻进解放军，并信口雌黄地说，若不是耿飚自己要求，叶剑英为何向外交部提出要调他到军队呢？

对于此事，耿飚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什么？叶帅向外交部提出要调我？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无论造反派如何追问，耿飚都是茫然一片。

后来，耿飚为了弄清这件事的真相，特地向老同志们打听。几经查询，才得知此事原委。“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次中央开会，会上叶剑英写了个字条递给参加会议的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字条上写道：军委考虑将耿飚调任国防部副部长，请炳南同志征询外交部党委的意见。后来，外交部党委没有同意，此事也就作罢。由于当时耿飚任驻缅甸大使，不在国内，因此对这件事并不知晓。若不是造反派提及，耿飚恐怕还蒙在鼓里呢。

造反派在政治上整不倒耿飚，就在生活上整他，不让他治病。由于长期受折磨，耿飚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终于病倒，经医生诊断为急性肝炎和肺结核，必须立即住院治疗。但造反派硬说耿飚是为了逃避审查而假装生病，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外交部，必须立即让耿飚到301医院住院治疗。造反派无奈，只得勉强放了耿飚。但是耿飚在医院住了十多天，尚未痊愈，就又被送了回来，继续接受批斗审查。

造反派不满足于此，还将耿飚全家扫地出门，勒令他们限期搬出东交民巷外交部宿舍，搬到黄镇一家居住的小楼里。耿黄两家人口都多，一座小楼根本无法住，没有办法，耿飚就叫已成家的孩子搬出去，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借房住。

8月7日，“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之一王力发表了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的讲话，即“王八七”讲话，外交部门一片混乱，还出现了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周恩来果断下令将煽动者王力和造反派头头中的主要肇事者隔离审查，并将被夺的外交大权重新收归中央掌握。但在江青等人的纵容和支持下，极“左”思潮继续泛滥，“打倒陈毅”的口号继续存在，社会上还不断出现“炮轰”周恩来的标语口号。耿飚和黄镇在谈到这些事情时忧心忡忡。

一天，耿飚对黄镇说：“我们是不是写份大字报，对外交部的这些问题和那个‘王八七讲话’，表明我们的看法？”黄镇欣然同意：“好啊，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我们起草后，给其他大使们传阅，赞成的可以签名。”

大字报很快写好了，主要观点是反对“打倒陈毅”，反对把我国正确的外交路线污蔑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把我国17年来成就辉煌的外交工作说成漆黑一团，谴责在外交部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潮，指出“王八七”的阴魂未散，还在干扰着外交工作，等等。这张大字报立即在大使们中间传阅，大使们纷纷签名。

这份大字报贴出后，受到了外交部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不久，91位司局级干部也联名贴出一份大字报，和耿、黄的大字报相呼应。这样，声势和影响更大了，一股正气冲破极“左”思潮的浓雾，在外交部内迅速升起。

“中央文革”很快得知此事。江青等人借机大做文章，把外交部出现的大好形势污蔑为“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一时间，耿飚和黄镇成了造反派批斗的主要对象，将他们打成“耿、黄反党集团”、“耿、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耿飚和黄镇之后签名的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四位大使，就被扣上“耿黄集团”中的“四大金刚”的头衔。

◇ 斗胆直言，建议中国改变援助阿尔巴尼亚的政策。

1968年下半年，在毛泽东亲自过问和周恩来的再三督促下，耿飚和黄镇得以“解放”。毛泽东在得知耿、黄因写大字报而被打成“耿黄反党集团”后说：“他们反对打倒陈毅，这没有什么错；他们反对外交部夺权，反对王力的讲话，那不但没有错，而且反得对，反得好。什么‘反党集团’，又是什么‘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简直是乱扣帽子！”1969年4月，耿飚得以“解放”，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5月6日，中共九大闭幕后，耿飚被任命为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1949年11月23日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后，两国、两党领导人多次往来。阿尔巴尼亚的党政领导人霍查、谢胡、巴卢库等多次到我国参加有关会议和庆典，进行访问。周恩来总理先后于1963年、1965年和1966年三次率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

60年代初，在国际共产主义大论战中，由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处在“同一战壕”，中阿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在一系列国际斗争中，阿尔巴尼亚坚定地支持中国。中国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了以阿尔巴尼亚为首的23国的支持。

1969年5月16日，耿飚抵达阿国首都地拉那赴任。可在到阿尔巴尼亚工作以后，耿飚逐渐发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

与西方的援助不同，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在自己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1954年以来，中国政府给阿尔巴尼亚提供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对于人口只有200万的阿尔巴尼亚这样的小国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了。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可达400公斤，远远超过中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

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曾经坦言：“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阿尔巴尼亚另一位领导人谢胡甚至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1969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当面质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竟然回答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当谢胡陪同李先念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他的谈话几乎句句不离要求中国援助，说阿尔巴尼亚需要有自己的



“鞍钢”，还需要有像样的机械工业，还要中国援助开发海上油田。谢胡还说：“在下一个五年计划里，将完全用中国的设备和材料。”李先念当即表示：“你们计划你们的需要，我们考虑我们的可能。”

耿飚对阿尔巴尼亚一些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后深感忧虑，因为阿尔巴尼亚在经济建设方面，追求大而全，战线拉得过长，非生产项目搞得过多。1969年，阿方非生产建设项目的投资就占国家总投资的24%，造成劳动力严重缺乏。根据阿方自己的计算，在第五个五年计划中，仅按1968年11月20日中阿签订的协定，中国援阿新项目的建设和投产就需要增加4.6万名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约等于阿国当时产业工人的38.3%。

另外，在阿尔巴尼亚，还存在一种向欧洲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看齐的思想，而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阿方在向中国提出援建电视台时说，计划在全国实现电灯照明后，做到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而在当时的中国，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黑白电视机还很少见。由于阿方领导人存在上述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他们向中国提出了不少极不合理的援助要求。例如，中国帮助阿方建立了纺织厂，但阿方没有棉花，中国还要用外汇买进棉花给他们。阿方制造出了服装，却硬要卖给中国，倒过来赚中国的钱。

有一次，阿尔巴尼亚副总理查尔查尼向耿飚提出，要中国帮助更换阿国某化肥厂的主要设备。该化肥厂是中国援建的，本应使用中国生产的机器设备，但阿方不要中国的机器，指定要用意大利的，中方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现在这台机器坏了，查尔查尼还要中国从意大利买机器来更换。耿飚当即拒绝了这个不合理要求。

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耿飚通过实地调查看到，阿尔巴尼亚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中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成的。他们还把中国援助的水泥、钢材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一万多个。中国援助的化肥，被毫不爱惜、杂乱无章地堆放在地里，听任风吹雨打而无人过问。耿飚对此感到非常痛心。

忧心忡忡的耿飚认为，我国对友好国家进行援助是符合国际主义原则的，但必须注意两点：一是要按照我国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据对方的实际需要和运用援助的能力。像现在对阿尔巴尼亚这样“有求必允”的援助办法，对于中国来说就是把钱物倒进一个无底洞，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而对阿方来说，则惯成了他们依赖别人，处处向别人伸手的懒惰习惯，不利于他们自力更生发展经济。

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说被毛泽东称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的“坏话”，无疑会带来极大的风险，会给江青等人以口实。但出于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特命全权大使的政治责任感，耿飚给当时外交部主管欧洲事务的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长信。

在信中，耿飚详细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耿飚认为，中国对阿尔巴尼亚援助是主客观不一致，即主观愿望是好的，是为了帮助阿搞好经济建设，但客观效果并不好，不但没有使他们的经济得到发展，反而助长了他们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鉴于此，耿飚提出国内在援助阿尔巴尼亚的规模、内容和方法上，均须重新考虑，通盘修改。

乔冠华看信后，对耿飚如实反映情况表示赞赏，对他提出的意见也表示赞同。他将耿飚的信转报了中央。后来，耿飚回国后遇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李先念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

周恩来后来和耿飚谈话时，也提起耿飚写信的事。他告诉耿飚，毛主席看了耿飚的信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耿飚所提关于改变援助阿尔巴尼亚政策的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实施。

1974年10月，阿尔巴尼亚再次向中国狮子大开口，要求中国在阿国“六五”期间提供约5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援助。中国政府对此持谨慎态度，认为阿方要求援助的数量过大，中国感到力不从心，也不利于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地发展国民经济，决定少给一些援助，只给10亿元的贷款。阿方对此很不满意。

在此前后，阿尔巴尼亚政府对中国发展与罗马尼亚的往来、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十分不满，并强烈不满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公开攻击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在继续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物资近30万吨、帮助阿方建成和基本建成10个项目后，终于于1978年结束了长达20余年之久的畸形的中阿援助关系，这是后话。

◇ 主政中联部后，耿飚大胆解放干部。

耿飚到阿尔巴尼亚工作一年后，一次不慎摔成骨折。回国休养期间，他的工作有了新的调整，1971年1月初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周恩来为此和耿飚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因为当时主管中联部工作的是中央常委康生。周恩来特别嘱托耿飚：“今后关于中联部的具体工作，可以多向康生请示。”耿飚有些不理解，因为他知道康生和江青等人关系密切，他作为“中央文革”顾问，伙同江青等搞了许多阴谋诡计，整了不少老同志。周恩来似乎看穿了耿飚的心思，解释道：“在中央常委中，由康生分工领导中联部。毛主席很信任康生。‘文革’前，中央指定刘少奇负责国际共运问题并指导中联部的工作，由康生协助；现在则由康生负责。毛主席虽然也要我负主要责任，但是由于我工作太多，忙不过来，实际上都由康生来管。所以，你有事当然要向他请示。此其一。其二，你在和康生接触中，也可以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和他们（按：江青等人）逐渐疏远起来。同时，还可通过康生来防止他们插手中联部的工作。”关于后一点，周恩来和耿飚谈过不止一次。

的确，康生既和江青等人有勾结的一面，却也有矛盾。“九·一三事件”以后，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王、张、江、姚结成“四人帮”，猖狂嚣张，康生因在家养病则受到冷落。康生已和“四人帮”产生了矛盾，加上重病缠身，所以无力顾及此事。康生在耿飚到中联部工作以后与他的谈话中，还多次提到自己和张春桥的纠葛。

鉴于中联部干部多被打倒，无法开展工作，耿飚向康生提议解放一批干部。康生同意了。耿飚回到中联部后，首先开会布置从五七干校调回干部的工作。经过耿飚的努力，解放了张香山和唐明照，并让他们立即参加领导工作。后来，唐明照担任了联合国副秘书长，张香山则被提拔为中联部副部长。

后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找到耿飚，说：“中央各部门有一批老同志相继得到解放。‘文革’前的外办和对外文委现已撤销，有些老干部如李一氓、张致祥等同志，原拟安排到外交部，姬鹏飞已同意，但造反派不答应，因此想改为安排到中联部，行不行？”

耿飚很爽快地说：“行！非常欢迎。”但李先念有些担心：“耿飚你倒很爽快，但是你们那里的造反派会不会反对？”耿飚答道：“中联部正需要领导干部，这些老干部有丰富的外事工作经

验，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您把这笔财富给我们，我当然答应得很爽快。至于造反派嘛，我不被他们所控制。”这样，李一氓和张致祥便被任命为中联部副部长。同时，耿飚还解放和提拔了一批局级干部。

康生晚年患病，常叫妻子曹轶欧代他听取一些部门关于运动和工作的汇报。耿飚认为这不符合组织原则，因此每逢去汇报时，只与曹轶欧谈些无关紧要的事，凡是重要的事，一定要面告康生。有时康生实在不能谈话，耿飚便直接向周恩来请示。

这样一来，耿飚便得罪了曹轶欧。曹后来还几次托人找到耿飚，想把中央党校的一个造反派头头推荐到中联部来任副部长。耿飚断然拒绝了她的要求。

70年代初期，我国的外交工作有了新的开拓，取得了新的进展。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得以恢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1972年9月，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率团访华。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此后，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耿飚也在考虑着如何开展中联部的工作。耿飚考虑可以同各国的社会党、社民党进行交往，也可以同第三世界国家中主张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政党甚至执政党建立关系。耿飚带着这个问题专门去向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如与一些友好国家的执政党来往，就可以同政府间的交往一致起来。至于社会党，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和我党的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彼此交往和交流。不过在目前情况下，这些事还不能一下子铺开，可以先找少数国家的社会党和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进行接触……”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后来中联部邀请了少数国家的社会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员来华访问。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中联部才将这项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 不向江青屈服，得罪“四人帮”。

江青欲插手中联部，遭到耿飚的抵制，他由此得罪了江青。耿飚到中联部后得罪江青的第一件事与她摄影有关。江青喜欢摄影，凭其特殊身份经常在一些报刊发表摄影作品。后来，江青准备在外文局下属的《人民画报》上开辟一个专栏。

外文局将此事上报中联部。耿飚考虑到《人民画报》是党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而且译成多种文字向外国发行，对外代表着国家的形象，而江青竟要每期《人民画报》都留出一页，供她发表摄影作品，宣传自己，这样做很是不妥。于是，对此予以拒绝。他对江青派来的人说：“虽然她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那也不能搞特殊。我们还是按照原则办事。”

过了一段时间，江青又派人给中联部送来几本书。当耿飚得知其中没有毛泽东的书，都是江青自己的小册子和“梁效”的评论集后说：“那就不去管它，放在那里就行了！”

好心的同志提醒耿飚，对江青赠书最好表个态，或者组织群众学习书中的文章。

耿飚说：“不必表态，也不用道谢。至于学习，我们现在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这些书谁愿意读谁就可以拿去。”

后来，有一次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耿飚、姬鹏飞和黄镇三人也参加了。散会后，江

青要他们三人留下来谈话。她说：“以前我和你们联系不多，今后希望你们经常到我那里走动走动，经常通通气。”“我这里有许多关于路线斗争的材料和书籍，可以给你们送去；你们那里有关运动（指“文化大革命”）和业务（指外事工作）的材料，也希望经常送给我……”

耿飚他们明白，江青企图通过拉拢他们来插手并控制外交、外事部门，他们三人谁也没有到江青那里去。

除了以上几件事得罪江青外，在外事活动中耿飚也得罪了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有一次，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率领党政代表团访问我国，由中联部负责接待，外交部协助。由于周恩来病重住院，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与外宾会谈，并陪同赴外地访问。

但是王洪文硬是挤进来参加活动。在赴外地之前，耿飚和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一道去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指示：在外地活动中要突出邓小平同志。周恩来预见到“四人帮”会利用这一机会来排斥邓小平，故特此作出这一指示。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在赴上海前夕，王洪文叫秘书通知中联部，提出要准备两架专机，由他自己陪同黎笋乘第一架专机先走，邓小平则乘第二架后面赶来，以便造成在上海机场的欢迎场面中没有邓小平的镜头，从而突出王洪文自己。

耿飚想，一定要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行事，决不能让王洪文的阴谋得逞。于是他立即打电话给王海容，和她就此事交换意见。他们一致意见，拒绝王洪文的无理要求。

第二天，当专机抵达上海机场时，耿飚料定王洪文早有布置，所以事先吩咐随行的中联部工作人员做好准备。果然，在机场的迎宾活动和后来的参观活动中，上海市革委会的那帮人使用各种手段企图排斥邓小平，突出王洪文。

这时，中联部的翻译和工作人员尽量把邓小平和主要外宾拉在一起，不让王洪文插在他们中间，从而挫败了他的阴谋。王洪文见自己的企图落空，便迁怒于耿飚，一见到耿飚便怒目而视。

“四人帮”对耿飚怀恨在心。在一次春节团拜会上，江青和参加者一一握手，但她来到耿飚面前时，瞪了他一眼，不和他握手，扭头就走。李先念看到后问：“耿飚，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江青不和你握手，是什么原因？”

耿飚便把江青要求在《人民画报》上开辟个人专栏以及她向中联部赠书后自己没有致谢等事说了一遍。李先念表示赞许，提醒耿飚说：“哦，你的胆子确实不小。不过，对这个人（指江青）你还是要当心呐！”

有一次，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邓”，没有通知耿飚参加。耿飚听说别的部长都参加了，但既然不通知自己，正好躲开了。不料，几天后张春桥见到耿飚，阴阳怪气地问：“那天为什么不参加会议啊？你对批邓究竟抱什么态度？”耿飚反唇相讥道：“你们不通知我，我能去参加吗？”这下得罪了张春桥。

1974年1月，中联部的造反派开始贴耿飚的大字报，进行“批判”、“声讨”和“揭发”，在北京街头和外地也出现了“打倒耿飚”的大标语。耿飚很气愤，当即对周恩来说：“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没法工作，可不可以辞职不干？”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过了一会，他又用和缓的语气鼓励耿飚说：“我送你三句话：人家打你，你不要倒！赶你，你不要走！整你，

你不要死！”

◇ 根据华国锋手令，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从9月下半月开始，报纸、电台、电视台突然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来了。报纸上用黑体铅字印出，做成通栏大标题；有的还把“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作为毛主席语录登在报头上。

“四人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准备工作。他们还在内部放出话来，说在10月7、8、9日将有特大好消息。

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突然打电话要耿飚去国务院会议厅商量事情。耿飚到那里时，外交部韩念龙、刘振华两位副部长已经先到了。华国锋径直告诉他们：“你们都来了，好！想和你们商量解决一个问题。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中，提到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9月30日已去联合国，10月4日要发言，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看用什么办法把他发言稿上‘按既定方针办’那句话去掉，时间还来不来得及？”

耿飚说：“因为时差的关系，纽约比北京晚12小时，所以离发言还有两天时间。”研究结果是，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走后，耿飚问华国锋，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4月30日晚上，毛主席会见外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省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讲话时发音已不太清楚，他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字条给我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临走时，华国锋对耿飚说：“近日有事要找你，你在家等着。”

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亲自给耿飚打来电话，要他迅速驱车到中南海怀仁堂。耿飚匆匆赶到怀仁堂才知道，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已在当晚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了隔离审查。

华国锋立即向耿飚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按：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叶帅郑重嘱咐耿飚：“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华国锋问耿飚：“你要不要带支手枪？”耿飚说：“手枪不必带了，但是需要你的手令。”

华国锋爽快地回答：“好！”当即提笔给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 十月六日”

接得手令之后，耿飚问邱巍高：“广播事业局是哪个警备师守卫的？”“是警备一师。”耿飚说：“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请你把这个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耿飚领受任务后，立即驱车去广播事业局。到达广播大楼时，已将近晚上10点钟。耿飚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带着其中的10名战士直奔广电总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事发突然，邓岗有些紧张。耿飚径直把华国锋的手令拿给他看。

邓岗看完手令，好久不说话。耿飚见他在思索犹豫，就对他说：“你如果要想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邓岗似乎明白了耿飚话中的含义，连忙说：“没必要了。”耿飚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成员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在邓岗打电话召集人的同时，耿飚请邱巍高和警备一师副师长王甫带着另外10名战士去掌握电台的播音室。他们立即在直播室和机房门前加强了岗哨。邓岗把广播事业局11位核心小组成员找来，耿飚把华国锋手令再次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

11点零5分，邓岗紧急召集由各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他的发言很简单：“根据中央的指示，最近宣传中有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不要再出现了。一定要把住！”

接着，耿飚给华国锋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耿飚考虑，光靠自己和邱巍高、王甫三个人，工作难于运转，经与邱等协商后，立即打电话把中联部张香山和冯铨两位副部长请来。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和电台的同志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节目胶带，包括文字节目和歌曲等音乐节目。耿飚告诉他们，主要掌握两点：一是播出中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二是凡节目中提到或涉及“按既定方针办”的，一律删去，还要撤换一些不妥的节目。

在党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耿飚奉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控制了这个重要宣传阵地的领导权，总的来说比较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取得了这场特殊战斗的重大胜利。后来有的文章说耿飚带了多少军队去占领电台，其实这是误传。

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耿飚和邱巍高等人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就离开了中央广播事业局。

耿飚在离开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翌日，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中宣部尚未恢复前，先成立临时的中央宣传口，将宣传舆论阵地统管起来。会议还决定由耿飚负总责。

一年后，1977年10月，中央宣传部恢复，宣传口完成了历史任务而宣告解散。

在1977年8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大和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耿飚相继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至1983年，耿飚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1988年7月，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6月23日，耿飚走完了他非同寻常的一生，享年91岁。

□ 《党史纵览》2005. 11

~~~~~

【历史一页】

东湖风云录（之四）

• 徐海亮 •

三、抓“南下一小撮”

8月下旬，北京部分南下的大学生在汉串联，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部分院校前一段受到压制的少数派到省委门口，和南下大学生一起，与省直干部、部分有组织（或自发）前来的多数派红卫兵进行辩论，在辩论中后者持“湖北省委好”观点。针对北京学生扰乱了武汉秩序，王任重安排北京红卫兵卜大华、宋要武赴汉，支持湖北省委和武汉的运动，卜对省委工作做了批评，也热情肯定省委工作大方向；他们严正指责了南下学生中的一小撮“狗崽子”的“混蛋”行径。南下造反学生多在湖北大学、武汉大学、武汉水院和华中工学院少数派学生里活动，并在湖大建立联络站，后树“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大旗，点火发动，队长换了几茬，直至1967年3月被军区客气送走；北京的中学著名红卫兵代表得到省委与各院校“官办”文革委员会热情接待。

8月28日、29日，针对外地红卫兵煽风批判和攻击省委，本地多数派宣传攻势加强；省委常委连续举行扩大会议商量对策。28日会议记录如下：

张体学：北京来的学生主要矛头对准省委，武汉地区大专学生矛头对准省委的约有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他们的逻辑：北京乱了，你湖北不乱？！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中有坏人，多数是糊里糊涂，有左派、中间派，有极少数右派。……

张体学：北大学生在武大，名字都是假的。我对他们讲，第一不能武斗，把你们打死也不动手，骂你也不动口……

宋侃夫：市委的问题可能爆发在第一师范，他们在追查市委有没有黑帮，说我们封锁消息，压制批评。

张体学：你亲自到第一师范去作个报告，高姿态去，不高姿态去是不行的。接待工作，你不能出面搞，到学校去讲，尤其是马上要燃烧起来的学校，我们要亲自去作工作。不去做工作，争取不了领导权，他闹的再凶，把革命的旗帜一高举，左派起来就好办了。关于自由讲台问题，各说各的，他要放，我们不讲不行，他说刘（按：指刘少奇）犯了错误，我们说不晓得，省委没有给我们正式传达，你怎么晓得的？他说是陈伯达在学校讲的。他怎么说的？他说只对你们讲，不能向外讲，那你为什么向外讲？辩得他没有话讲了。……

对付外地串联学生的决策，也终于在8月29日省委常委会议作出，记录如下：

张体学：“我刚才给任重打了一个电话，把我们的决心讲了一下，要高姿态，不怕乱，准备乱两个月，刀山要上，火海要闯，七、八所大学没有问题。外来的学生发动武大，湖大攻跨省委，我们不会有湖南省委的结果。任重讲：‘你们很主动，我知道。’我们应该相信大多数群众，相信湖北省委攻不跨的。关于搞《呼吁书》的问题，我也给任重讲了，他同意。搞《呼吁书》的办法：一是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出现，二是以学生的名义搞，三是以个人名义搞。全国的情况，我没有问，他说有一个信回来，也是这个意思。北京来的学生一、二、三，左、中、右都有。他说要把名字搞清楚，我们说搞不清楚（许道琦：将来查得清楚，跑不掉的）。

王任重这里明确赞同呼吁湖北人民保卫省委，要盯住南下学生，秋后算账。

王树成：“我觉得是个大事，虽然名义上是《呼吁书》，是用学生名义写的，事情非常重要。过去没有的事，过去先支持革命行动，对反动行动没有批评过，过去批评反动的事情搞错了，现在，这一着就不轻易拿出来了。任重同意，当然这个事情可以作了，需要把措施搞具体，要找几个学校研究，经过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学生同意才发出去。发出《呼吁书》的时候，代表团往北京一走，把《呼吁书》一带，这像打仗一样，一打就主动，不能被动。把他们的反对标语、反对言论都印发。……粉碎一小撮反动言论。

许道琦：“这回和过去反击不同，不能全面的反击，通过《呼吁书》，写信，把他们具体分析一下，使我们本市的学生发生左、中、右的分化，越分化明显越有利。《呼吁书》发出去，广播宣传，主动向南下比较好的学生宣传，严格区别开来，把他们的大字报和言论主动地介绍。作得好，南下学生出去支援《呼吁书》，出现这样的形势就好了。（张体学：不管北京来多少，我们欢迎，现在他们控制不住。）（李衍授：外来的好人和好人结合，坏人和坏人结合。）《呼吁书》上要讲明，特别是最近有组织来的学生是很好的。（赵修：不能反击。）（张体学：不能用反击的名字。）（王树成：只能说是捍卫主席，捍卫党中央。实际上，他们看到我们摊牌了，他要拼命地斗的。）（李衍授：他唯一的办法是要我们犯错误，我们犯错误，他们就抓住了。）（张体学：有事就找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来说，不能靠打电话联系了解情况，好多情况是假情况，那些流言蜚语不要把自己的思想打乱了，这样搞对左派是极大的支持，也要防止左派感情用事，否则把有利变成无利。）

王树成：“今天下午，体学讲的作为我们总的部署，不怕乱，顶多了不起把办公楼打了搬到武大去住。（张体学：我们不能搬到军队去住，哪个干部投降就开除党籍。）要完成这个部署有两种作法，一种是等着他来，最后上山，如果在这个期间，我们作说服工作，说服不了再从珞珈山赶下来就更失败了。这一条就算对，我们作了总结了。现在看，第二种情况还不可能有，但要准备有这样的情况。今天晚上，明天一天，把《呼吁书》的材料准备好，明天晚上把这一张牌摊出去，提一个新的口号，大张旗鼓地讲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不管你南下北上的，把他们的材料搞出来，这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决心很重要，方法好办”。

在这次关键的常委会后，正式开始反击北京南下造反学生，省领导策划的《呼吁书》以湖北大学学生名义发表，称来汉北京学生有一股“逆流”，同时提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次日，武汉市委也以群众名义发出“紧急呼吁信”，号召抵制北京来的“南下一小撮”。王任重派遣北京著名的老红卫兵来湖北帮忙，要死死稳住自己的后院阵脚。但这次他走错一步棋，南下学生在京早已眼界大开，他们决无武汉学生那样，对王任重深怀敬、畏。他们在北京一时似无对手，但以王任重为后台的湖北省委，完全可以小试牛刀。王从8月1日受总理委托管清华运动，也随即得罪了清华的八八串联会和蒯派的学生，而某些清华少数派学生，正是南下造反大队的成员之一（当时的核心成员是人大和北大的，第二拨核心有了北航与其他）。平心而论，当年北京南下学生，有的是北京的少数派造反者，带着“炮打”和“怀疑一切”思路；也有的在本校并未造次，甚至是所谓的保守派，仅仅是把北京十分激进的思潮带来武汉，对湖北省委以往做法极不满意。在8月底，他们高举“怀疑一切”革命大旗，比任何一位武汉学生都要来得彻底和造反。省委毕竟不乏搞政治的老手；为与反击南下学生决策配合，29日省委公开抛出省委宣传部长曾（个亨），消息见报；继而抛出抓政法工作的副省长陈一新，打为“黑帮”。

四、张省长宣称“天上九头鸟”

9月1日省委在中南路工业建设展览馆召开多数派红卫兵会议，张体学公开表示：湖北省

的运动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的，省委是个大红帮；指责南下学生中有右派，运动后要划为右派。这天，主席台上的张体学显得十分自信粗犷、潇洒简单：“今天来的都是左派，你们不要做叛徒。做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昨天你们开了个欢迎会，狗崽子们不识抬举。那个大个子傅军胜是一个右派。他反对老子，老子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没有他们强？！（众活跃）他们是没有好结果的。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运动后划成右派，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哄堂大笑）……这些狗崽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跟他斗，他就要失败。你们腰杆子要硬起来”。

在文革中表现的省委书记里，张体学的性格是非常很可爱的，他率直刚烈，多次当众述及放牛娃苦出身而今惨遭学生批判，潸然泪下；到1967年7月与北航红旗的韩爱晶谈心，依然为自己苦出身，革命征战、挥汗经济建设一生，反被造反派批斗成“反毛主席”而痛苦，说武汉造反派出身不好，若如北航“红旗”，尽皆干部子弟，又何谓不放心呢，权交给这样的造反派就放心了。后来在省市革委会里，大家混熟了，群众代表老拿这些旧事开张体学同志的玩笑。而张体学也是一个认真人；在1968初年进入省革命委员会参加“三结合”前夕，他按毛泽东、周恩来的要求，有一个对武汉人民群众的书面检查，还专门旧事重提：“当北京南下同学冲击湖北省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恼羞成怒，采取了许多卑劣手段，对他们进行刁难、分化、污蔑、打击、围攻，同时大肆制造舆论，进行恶意中伤……由于我镇压革命造反派，大长了资产阶级威风，一片白色恐怖铺天盖地向革命小将扑来……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受过我的打击迫害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认罪、道歉……王任重令其省委整理南下同学黑材料，我积极照办，整理‘南下一小撮’的黑材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看了以后煽动地说：‘你们的材料，不如上海老工人写的短小、精悍、有感情’……妄图向党中央、毛主席施加压力”。

特别难以置信的逸闻是：就在73年他去世前两个月，他在北京还找到原南下造反大队涂仰豪，恳切倾谈6年多前镇压了他们，实在是对不起；其实，学生娃娃下乡下厂，拿工资当干部，早已前嫌尽消，当年的“镇压”壮语和行为早已成为民间的笑话了。

武汉掀起抓“南下一小撮”、驱赶南下学生浪潮。但南下学生并不瓢荏，紧接在次日，由人民大学赵桂林、傅军胜等多人，于省文革办公室门口召开揭发控诉湖北省委大会。紧急之中，省委常委也同时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张体学作了重要讲话：“一、有两个臭逻辑：北京乱了，湖北不乱？湖南乱了，湖北不乱？左派、中间派脑子很热，右派以极左的面孔出现，抓住了领导权。因此，（一）我们的战术要灵活，方法要具体……（二）北京来的学生提出的问题，凡是对革命有利的事，我们都要办，他们所放出来的不管是香花还是毒草，都给他们印。……（三）对内部学生的右派要采取高压政策，工学院的右派跑到武大放毒要抓住整他，不能内部右派嚣张，等到外来学生走了，再让他放出来。二、外地来汉的学生好些，不会再是高峰，高也高不了好多了。武大、湖大、武医、华师、农学院攻不跨的。左派担心湖北省委是不是顶得住，中间派担心湖北省委是不是黑帮，这五个大学攻不跨，其他的大学不行，湖医革委会主任跑到北京玩去了，工学院不要紧，测绘学院是一个导火线。水利学院多数人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少数人在闹。革命委员会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要斗刘真，一派意见要斗李凤祥。我的意见两个人都去，李凤祥是少数派，刘真是多数派，保护张如屏的，叫他们讨论，要回去都回去，要不回去都不回去。湖医没有搞起来，我的意见搁着，不要烧火了，烧得好是好火，烧得不好可能烧到我们面前。三、湖北省委头可断，血可流，千万不能干王延春那样的事。哪个要干什么，是合理的就支持他，他打着红旗反红旗，你也要支持他，如果他一个劲地念语录，你也要跟着他念，你不念要犯错误的。但要注意一个问题，对他们态度要沉着，有一批人在糊里糊涂地闹，他们的精神可嘉，骂我们是黑帮，不要紧，不是黑帮骂不成黑帮”。

王树成：现在的情况是相持阶段，坚持就是胜利，再搞三、五天，该讲的话讲了，如果再转，是另一种形势，目前情况集中在湖大，再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像湖北大学那样的《呼吁书》

只能出一份，像刘小青三人讲演，也只能印三份，现在看，应该采取武大的办法，他提十一条，我们提十一条，调子要高一点，如果调子不高，显得力量不强，有理才有力，先把他们看成是百分之九十五，是人民内部矛盾，就可以把少数的百分之五孤立起来，湖大非要硬着头皮顶住，不能有丝毫动摇。

张体学：香花毒草都让他放出来，他一张我一张，他印一千张我印二千张。

据华工学生鲁礼安回忆，当日在湖北大学47号平房西侧墙上，贴出了一张题为“为南下革命师生呼吁”的大字报，大声呼喊“中南学生危急！湖北左派学生危急！华北南下革命学生危急！”称此北京南下红卫兵为一股强大的真理的洪流，呼吁全市革命群众站出来“支持”他们、“保护”他们，和湖北省委内的一小撮“反革命黑帮”作斗争。他在大字报中指责要将南下学生赶出湖大的湖大临时文革会“只能代表一小部份人”，是“虚假的多数”，说“在现阶段就是可以不服从多数，道理很简单，因为真理就是掌握在我们少数人手里。”

9月4日，省委常委举行扩大会议。张体学做了概括性的安排：

一、明天开欢迎外地革命师生、职工大会，可能会出现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骂够、讲够、坐够，准备干八小时。头天讲不完第二天讲，讲它一个礼拜。第二种情况，把我们拉下来游街，要走一路走，我就朝湖大、武大和华师走。第三种情况无非打人，如果打伤了，我就到处演说，拍照，在《湖北日报》发表消息。准备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不行就两个礼拜，两个礼拜不行就搞半个月，最后留下几个人还不愿意走，红卫兵就和他辩论。

二、湖大、武大搞小型辩论，用大字报辩。其他学校不要到湖大武大去支援了。

三、不管十条罪状，多少条罪状，湖北省委不是黑帮。

四、我搞病了，树成同志代行职权。我和道琦、衍授、宁夫、阎钧去，辩一个礼拜，他就跨了，我们辩不跨的。

会场外，南下学生40人在省委静坐，高喊“打倒湖北省委”，要求与张体学对话，停止迫害。次日，部分武汉学生也参加静坐，决定绝食抗议。针锋相对地，到晚上，省委书记王树成发表广播讲话，揭露赵桂林等组织在省委闹事真相；在另一场合，张省长再当众挥泪痛斥人大学生赵桂林，保护省委的群众展开与南下学生激烈辩论。武汉出现抓“南下一小撮”的热潮。一些人在省委门前扭着秧歌演唱“湖北省委好”（套用《人民公社好》的曲调，“一唱呀…二唱呀……”）；水利学院有学生与教师数人，不畏艰险，顶着讥讽，出面与南下学生辩论，声言就是要保卫共产党的张省长，要做党的好儿女，被该院造反学生嘲笑为张省长的“好儿女”“五朵金花”；特别到颇有点“痞子气”的同学公开指出“儿女”之一，是彭德怀集团成员周小舟的儿子——不幸的周宏，他在武汉三镇播放保卫省委的义正词严、风流倜傥的演讲，顿时遭至嬉笑怒骂，拥护者困惑而尽散。

南下学生部分人进京告省委状，9月8日，陶铸接见傅军胜等九名南下的大学生，听取其汇报、申诉。陶后来表示，当时进一步感到湖北省委在运动中问题较大。但是由学生记录的讲话内容，与省委传出的出入较大，又在武汉引起争议，直到后来到陶面前再次告状。陶铸遂转告王任重，王又电告张体学，要他做些自我批评；张对陶、王要求一再表示困惑不解。另据回忆：“省委发动驱赶‘南下一小撮’，南下学生就开始进行9.2—4绝食，进行抗议，在他们绝食的时候还有‘三字兵’（按：指老“红卫兵”）在旁边唱歌说‘湖北省委好，就是好、就是好’，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旁观者，在那里看热闹。后来何庆慈说南下学生要回北京去向中央汇报，

我们就跟着上北京去了，在北京的时候住在人民大学。要陶铸接见，后来陶铸就在一个晚上到人大的操场来与学生见面，看上去陶铸很精神，还穿着港衫。回来传达就是三条，中心是湖北省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因为中央领导人表了态，所以腰杆子硬了。后来张体学在自己的检查中说到要把赵桂林（人民大学的南下点火学生）捉去劳改，他要亲自去当劳改队队长。在三结合之后，我问张体学为什么那么恨赵桂林，他说你不知道呀，陶铸真是反革命两面派，他给我的三条指示说，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给你们的指示正好相反”。

王任重曾在9月6日电话指示中南局：最近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一些问题，根据我个人记忆，向你们报告如下，中央还会发正式通知和指示。……（略）

上述意见，请转告广东省委和广西自治区党委，供他们参考。湖北由我直接告诉他们，河南，湖南由陶铸同志打电话，必要时你们也可以直接与他们联系，等中央正式通知和指示到达后，上述意见与中央指示不符者，一律照中央正式指示办理。

……

9月8日，陶铸、王任重给湖北发出类似电话，也讲了同样八条意见：

1、所谓炮打司令部，主要是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他们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错误和缺点，应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应该号召炮打。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仍然应该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方针，也就是治病救人的方针。

2、要教育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善于分析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待。

3、目前的文化大革命重点，仍是中等以上学校和大、中城市的党政机关。农村县以下要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革命、促生产，夺取丰收，暂时不进行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放在秋后冬季进行。

4、工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仍按原来的部署，结合四清运动进行。说服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学生不到工厂串联。对工厂领导有意见可以派代表送大字报，各个工厂可以在门口建立接待站接待他们，教育革命的学生，不要到工厂去，以免妨碍生产。

5、工厂、农村所有犯错误的干部需要撤换的时候，一律要呈报上级党委批准，不要随便罢官，以使生产正常进行。

6、机关、工厂没有组织红卫兵的，不要去提倡。已经组织起来，也不要解散。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可以为市单位成立总的指挥部，设主任、付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实行轮流值班制，以使领导人脱离原单位群众。机关、工厂的红卫兵一律不参加这个指挥部。

7、红卫兵年龄限制在三十岁以下，参加红卫兵的条件：（1）出身成份好（劳动者家庭出身）；（2）政治思想好；（3）组织纪律好；（4）关于红卫兵的条件应当通过红卫兵代表会自行讨论通过。

8、国家党政机关，学生不要去串联，如送大字报，热情欢迎，如去串联开会，婉言拒绝。申明：工人、农民、干部不参加学生组织的会议，这是一条纪律。

这8点指示，与给中南局的基本意思相同，而中南局多一些正确对待北京学生的记录，这里可能仅仅是一个概略原则和政策要求。看来陶、王要求灵活，但内心自然同情省委，且湖北对北京学生究竟如何办，另有特别指示给张体学，其电话无记录传出。

按照省委议定安排，9月12日，张体学参加武汉大学红卫兵大会，并着新军装乘敞篷吉普车检阅红卫兵。是日，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后称一司）。后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检查也回忆到：“我跟张体学，他叫我就去，通知我开了四次大会，都是保守派召开的大会。一次是武大，名义是纪念毛主席观察的，九千人的大会，我去了，这一次，我还讲了话，当然是讲意义了，也讲省委没有大问题。一去就是保省委，镇压造反派的，因为我们还是以解放军的名义嘛，玷污了解放军的名誉”。不过，张省长着军装检阅红卫兵，立即遭到怀疑，多数派红卫兵参加了武大的活动，有人回学校就说：“张体学好威风啊，他想学毛主席啊……哼”！是的，那时，一个地方首脑，想模仿毛泽东着军装坐吉普车检阅准军事组织的群众，意欲政治上巩固自己，太出格了，很容易被看成犯了大忌。以后造反派批判张、封闭省报，无不点出此事，弄得张实在是灰溜溜的。

9月15日，张体学在洪山礼堂代表全省三千万人民控诉南下的大学生赵桂林，涕泪横流。批评赵桂林围攻省委，篡改陶铸的三点指示，公然宣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全市街头出现数日大辩论“省委是否犯了错误”。一时三镇气氛紧张，19日，把南下“右派”学生当假想敌的张省长居然在省委内宣布“我们赢了”！不过，这个回合看来是严肃的阶级斗争和书生意气交织，实际上吸引了众多工人和机关干部，在拥护省委的极高强声浪下，正暗暗滋生怀疑省委作为的潜流。

武汉机关和工厂企业的运动，8、9月尚无太显眼的进展，但对抗的能量也在暗暗积聚，实际上它在运动以前业已定型，现在有了表现和触发的契机。王绍光的《理性与疯狂》对此有个概括：“文革开始时，武汉多数单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没有结束……在那些职工多数是知识分子的地方，比如医院和科研文化机构中，资产阶级权威和孝子贤孙和学校里一样，也是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且常常是有许多人遭到批判”。“在工厂里，资产阶级权威即使有的话也是很少。所以，斗争的矛头就指向那些过去犯过错误的人或者落后分子……受过较好教育的政治积极分子才对工作组的号召作出反应。但他们所做的基本也是，或者攻击那些过去运动中批判过的人，或者把落后分子的琐碎错事上升到原则来批判他们。因而在许多单位，大约10—20%的职工以大字报的形式遭到批判”。

其实情况比未亲历当时的王绍光调查的要复杂丰富得多，批判和压力也不仅局限于所谓落后分子。一些工厂，有了如重型机床厂和武钢、武锅那样的分歧，以至在工人群众和文革积极分子里都设置了批判对象，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也不是每人都赞同在高校学生里争辩、斗争的官方舆论倾向，社会上的群众分野潜流已在形成，只是不如青年学生那样冲动与激昂罢了。连重型机床厂的业余诗人朱鸿霞（后造反工人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尽管已经被视为“三家村”文人、异类，居然也对南下学生炮打省委持批评态度，“还说学生把好好的一个社会搞乱了，劝说学生不要这样搞运动，参加辩论批评北京来的学生，结果不仅没有说服学生，反而被学生说服了，就在厂里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朱妻回忆）。南下学生喧闹的9月，实际上酝酿了初始的工人造反者。

在中学红卫兵“破四旧”中受到冲击的原资产阶级分子、右派分子和亲属如何看当时的运动？他们在单位里或街道上都受到“横扫”和“破四旧”的极大冲击，以至是难以忍受的人生凌辱。人们当年很难知晓他们内心对运动究竟是什么想法。不过到1967年，青年学生终于明白，这些在运动初期受到传统政治文化冲击、压抑的人们，从内心深处是同情武汉造反派的，更不要说充满市民感情的普通武汉群众了。

就在湖北省委不得已捧上了北京来的“烤白薯”，渐次降温时，武汉一批批少数派群众，悄悄地陆续进京，打探消息，联络战友。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省委门前看看，或到其他学校找找相同观点，而要去北京探知究竟。8月31日，武汉一批学生参加了毛泽东的第二次检阅，接着，更多的人听说情势，也争取参加了9月15日的毛主席接见。

其后，如武汉大学有学生回忆：“我们得到消息，说是周恩来总理当天晚上要到清华大学参加一次集会。我们这些到京的同学好像疯了一样，不到晚上就纷纷往清华大学集中。晚上大约快到九点时，周总理到了清华大学，先指挥大家一起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这是我亲眼见到周总理的风度，真是敬佩得五体投地。他那残而并不废的右手微带一种自然而不难看的弯曲，很自然地打着拍子。人很清瘦也很精神，使得到会的同学群情激昂，会场气氛很快达到沸点。唱罢歌之后，周总理发表了即席的讲话。这次讲话，可以说是真的彻底解决了我思想上的顾虑。因为他说，革命不是要人指派的，革命是靠自觉自愿的，我就一贯支持自觉起来闹革命的群众组织”。

不仅是见到了总理，一些学生，甚至极个别工人，也在北京学生帮助下，聆听了文革小组成员对北京学生的接见讲话。从北京回汉的学生，第一件事就是结社建立组织，“8.31”、“9.15”、“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红八月”红卫兵小组一个个出现。这些自发的结社组织陆续得到省文革领导小组的承认，并在省文革或院文革领取活动经费。同时，得到省市市委资助的少数派红卫兵公开打出“造反有理”的旗号批评省委和王任重，并渐渐称为造反派。

多数派学生这时主要坚持在本地斗争，保卫省委，也有极少量学生有组织地到北京取经。王任重百忙中接见了他们，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湖北省委是有看法的。湖北省委的问题没有什么了不得。南下一小撮在湖北闹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把运动推迟一些。（按：王的话语根据“左派”骨干现场记录与披露，11月被公开）

9月26日，中南局的金明书记转告了陶铸的几点意见：

很好研究主席批青岛报告，林彪同志，周总理的讲话，人民日报社论。主席站得高，看得远，我们要很好地跟。不要同学生闹对立。最近中央发了许多指示，不要又走到限制学生一面去。林总讲话后，有的曲解，又压制学生。主席听到许多干部说，只许学生讲话，不许干部讲话，这还是顶牛思想。总的还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各方面稳住，让学生闹一下怕什么？亮亮（按：陶的女儿）说把老干部整得太厉害了，这个意见不对。这么大的群众运动，难免出点问题，戴高帽子……有什么要紧？广西天天发电报，影响不好。湖南下面情绪，也值得注意。不是黑帮打不成黑帮。炮打司令部还要认真搞，广西就没有搞什么。各地比中南海闹得厉害得多。总的精神还是要放。

干部处理要慎重，群众自己罢没有办法，领导不要随便同意罢官。

抓好生产，两个班子，人不要多，直到地委。现在就成立，不要等运动缓和时再成立，开个名单出来，如毛教授、华罗庚等。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如黄洁、郭棣活，斗已斗了，还要照顾。民主党派问题，主席说放一下再说。

学生运动是一潮流，不可抗拒，谁抵抗谁倒霉。国庆后还要有高潮。江苏搞了六个回合，福建七个回合，没有六、七个回合不行。（浙江搞了三个回合）

河南罢官，也要一分为二，北京去的学生反映好。

不要吹自己，不要讲过五关，多讲缺点，就主动了。学生就不相信没有缺点。

陶铸当时这个意见，是针对中南地区带普遍性问题的，甚至也透露了国庆后运动还有新高潮。不过这些原则性的意见，传达到下面，领导们当时并不一定明白就里。

五、武汉运动的仲秋

9月下旬，武汉学生没有如原来张省长十分家常估计的那样，在三、两月内结束运动，争取中秋国庆回家“看嗯妈”；中秋之时，湖北省委文革领导小组已经组织武汉大中学师生数万人，成建制地进京串联，参加国庆活动。多数派和少数派都回到本班，欣喜地也有组织秩序地陆续抵京。有的学生干部要一早参加国庆的观礼活动，前夜就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家中休息，兴奋的彻夜未眠。

1966年的国庆节，数万武汉学生在北京参加了国庆庆典活动，他们绝大多数人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欢天喜地，决心紧跟革命统帅，把这场旨在防修反修的革命进行到底。但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心里却是十分沉重的，他在北京和中南分管运动，他与文革小组其他负责人分歧加大，在文革小组内部受到指责和批评。清华大学点名批判他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中央文革点定了北京造反红卫兵的左派地位，商量且点定了国庆上天安门观礼的名不见经传的造反学生领袖，他内心确实有保留的。他清楚，他们这些从中南升起的文革新星，正在迅速暗淡下来。更重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知晓了毛泽东一再提出要彻底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而且认为周恩来和陶铸都没有解决问题。和陈伯达、张春桥一起受命起草林彪国庆讲话稿的王任重，完全知道大家对讲话稿中所谓“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提法的来回斟酌内情。鉴于中央对湖北情况有所批评，彻底批判也势在必行，该日，他明确指示湖北省委必须作自我批评，并承认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是革命闯将。这仅仅是他自己吞下的第一枚苦果（如果清华运动和支持“西纠”不算的话）。他主观上想紧跟毛泽东，国庆观礼中，毛泽东时而回城楼室内休息，王也随之入内；他可能没有听见江青就在他身后故意地大声喊叫：“王任重也是，什么事也往里贴……”！

国庆活动以后，武汉学生按原来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的计划，也陆续成建制分批返回。但是，其中的少数派的活跃分子没有跟本校同学走，他们决定留下来；10月6日，滞留在北京的武汉造反红卫兵和其他学生，参加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烈开火誓师大会”。如果说湖北省委曾经主导了6、7月的对少数的压制，9月又倡导了对南下“一小撮”的痛击，都还未直接打得开武汉造反——这造化打造的潘多拉魔盒——魔盒却由省委敲锣打鼓原封运到北京——赴京观光。武汉学生造反派——这盒子里的“恶魔”——从1966起行将被反复控诉数十年的“恶魔”，终于在北京放了出来。

不过武汉大学生中敢想敢干的人，早在8月底、9月里业已自行进京。在8月31日的参加毛泽东接见群体中，有一个武汉测绘学院学生，名叫杨书贵，河南省镇平县人氏，他是1966届毕业生，四清运动里入党的学生干部；运动开始批判“三家村”时，他正和同学在衡阳国家测绘总局三分局搞毕业设计，也积极参加了分局的四清运动。他写大字报主张“上下邓拓一起批”，实质上就指向了分局领导；分局领导反过来组织大字报云“大小邓拓一起抓”，矛头指向了群众，甚至捎带参加运动的大学生，错误批判了仅仅是对运动方法持不同意见的学生，他出于打抱不平说公道话，也被疏远冷落。当局整理测绘学院学生的材料，被送到国家测绘总局，也送到中南局和学校。到8、9月，武汉测绘学院都属于张省长指责较乱的单位，省委抛出在蒲圻带领学生参加四清的院党委副书记张肇翼，参加四清的学生积极分子受到压制打击。两种思潮分歧显著，杨对运动也渐渐形成自己的倾向；不过，他自己也承认，在9月份，他对所谓革命造反的理解，还是十分温和的，对王任重和省委，也没有形成条理性的认识，一切观

念的形成和行为的发展，总都有一个过程。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北京文革形势的感染，使他决心要跟随毛主席革命到底；回到武汉就组织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1967年的巴黎大革命一样，那时时兴更改有封建、落后文化色彩的人名地名，“书贵”者似乎非革命化，他看中毛泽东的“七·三指示”里勉励年轻人的话，中国和世界革命“任重而道远”呵，遂改名“道远”。

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1966年国庆之后，武汉的局势居然成了不是“任重”就是“道远”——和原来尊敬的王任重书记，要一比高下了。

说明：

本文引用有关陶铸与王任重的一些讲话、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指示、会议记录，出自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资料，2005年；并参考、对照当时红卫兵印发的资料文献。

其中湖北省委常委会议记录，系1967年元月省委办公厅某副处长试图销毁记录时，被省直造反派截获并公布于众。该原件在1968年武汉“反复旧”中，再次被原“省直红司”干部抄眷出来。引用时已经核对过湖北省五七干校信纸抄眷件。

（未完待续）

□ 《东湖风云录》 徐海亮编著 银河出版社，2005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